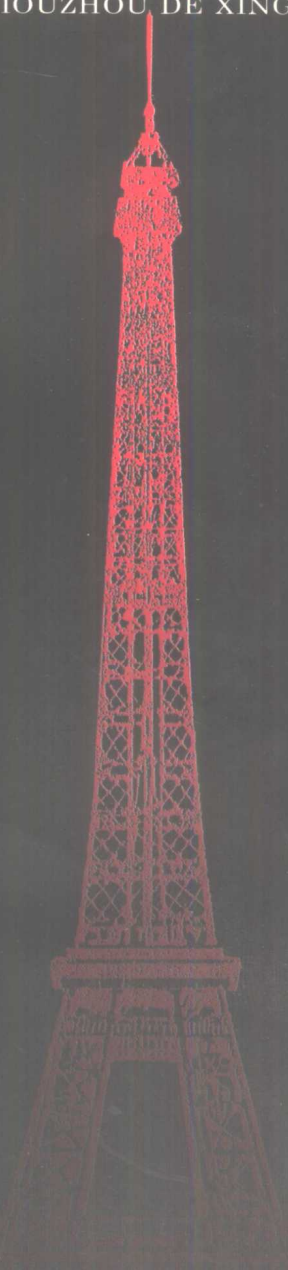


JINDAIOUZHOU DE XINGQI



朱孝远 著
学林出版社

近代欧洲的兴起

JINDAI OULAZHOU DE XINGQI

近代欧洲的兴起

朱孝远 著

学林出版社



近代欧洲的兴起

作 者 朱孝远
责任编辑 乐惟清
特约编辑 严耀中
装帧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三楼(200233)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常熟第四印刷厂
版 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850 × 1168 1/32
印 张 14.25
字 数 35 万
印 数 3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 - 80616 - 341 - 7/K·24
定 价 20.00 元

导 言

在世界历史中,没有什么事情比近代欧洲的兴起更加引起人们的兴趣。经济落后、政治紊乱,自黑死病以来就饱受战争、饥饿和瘟疫之苦的欧洲,却有幸孕育了近代文明的诞生。近代欧洲的兴起之所以重要,不仅是它变更了中世纪的政治、经济、伦理、宗教和道德观念,更为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一种新的文明体系,建立了新文化、新政治、新经济、新教和新价值观。因此,在人类的发展史中,近代欧洲的兴起这一页是不容轻易翻过去的。它体现了一种转折,隐藏着许多历史之谜。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探索,如今人们对欧洲史上的这个转变,已有了一些新的初步的认识。

尽管有许多人都关注近代欧洲的兴起问题,但人们对它仍存在一些误解。首先,是关于 1800 年前欧洲没有巨大转变的看法(即误解)需要抛弃。历史学家格哈特所著的《旧欧洲:关于延续性的研究(1000—1800)》一书,集中代表了上述观点。格哈特把 1800 年以前的欧洲看作旧欧洲,理由是那时没有民族化和近代化。格哈特认为,人们对欧洲历史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受 19 世纪民族主义观点和现代社会必然是从以前社会发展而来的假设的影响,因此,过于强调了前近代欧洲历史中所谓的阶级冲突。他进而研究制度,认为 1800 年以前欧洲不存在着突变,因为没有什么

近代化和民族化的特征存在。他的结论是:1800年以前的欧洲是旧文明,经济上是自然经济而非交换经济;政治秩序的建立是以自然血缘法统为基础,而不存在竞争与革命;文化上强调集体主义,不强调个人主义;宗教上是超自然的神的主宰,而不是自然主义。从这些出发,他否认把中世纪晚期的商人看作社会变革的动力。他断言:“那段时期所反映出来的特征是合作与地区间的联系,而这仍然是旧欧洲的基本特征。旧秩序的基本特点一直保留着,尽管发生了像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那样的运动。一直要到17世纪末,上述中世纪的特征才开始衰微,直到法国大革命前夕和工业革命开始时才被抛弃。”^①格哈特的观点,否认了1800年前欧洲有伟大的社会变革。这就使得近代欧洲的兴起成为飞来之阁,近代欧洲如何兴起、为何能兴起的问题成了无稽之谈。

第二种关于近代欧洲兴起的误解与“中世纪孕育了近代欧洲文明”的观点有关。这一说法模糊了中世纪与近代的界线,认为中世纪欧洲文明从未死亡,它能自然而然地转变为近代欧洲文明。这就涉及到对一系列社会运动和社会制度评价的不同意见。持上述观点的人否认文艺复兴是近代欧洲的开端,提出了“12世纪文艺复兴”这个概念,其实,被著名学者布根哈特所称道的个人主义和创造精神早在12世纪就已出现。宗教改革运动的划时代意义也被视而不见,有的学者认为宗教改革运动实际上是对文艺复兴的反动,因为它引发了战争,同时宗教虔诚代替了世俗精神。^②在政治制度上,美国中世纪史专家斯特耶著述的《近代国家的中世纪起源》一书中认为,近代国家起源于中世纪,是中世纪孕育了近代国家,^③按照这种观点,无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还是近代国家的产生,都只是中世纪文明的延续。它们是否具有近代性或进步意义,都是值得怀疑的。

关于近代欧洲兴起问题研究上的混乱不只限于上述两种误

解。即使是赞成 1800 年以前欧洲曾有过巨大变化和转变的学者,也存在不小的分歧。首先,是关于近代欧洲产生的标志的争论。早在 18 世纪,亚当·斯密就提出 1492 年哥伦布和达·伽马的地理探险是一个标志。黑格尔认为,路德宗教改革是一个标志,意味着一个自由和自我的新阶段正式到来。马克思认为,变化起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和交换。韦伯认为,不自由的城市向自由城市的转化是一个标志。此外,还有学者认为,宗教改革,活字印刷术在欧洲的应用,英国和法国的新君主制,哥白尼、加里略和笛卡尔理论的出现,都可以作为标志。在自由派学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中间,都有人赞成在 1350—1650 年间的欧洲出现过巨大转折。还有一些学者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近代欧洲的起源问题,从而认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可以作为西欧近代化的标志。布根哈特对文艺复兴令人折服的研究最后构成一个命题:意大利是不是近代文明的最先产儿?

其次,近代欧洲的兴起是否就是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对此,学者们在以何种方式取代问题上意见并不一致。英国经济学家道布提出,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发生在十五六世纪,理由是从 14 世纪起,黑死病、农业危机等因素促使庄园制向租佃制的转化;16 世纪时,市场经济的障碍被扫清,同时商品化和雇工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历史学家斯维策虽然也赞成十五六世纪是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期,却反对道布的意见。他的理由是,中世纪的革命因素不表现为租佃制,而表现为城市中交换制度的发展。他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和交换、农村和城市、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是理解社会形态变化的要素。斯维策反对把资本主义的兴起说成是偶然因素的推动(如黑死病、庄园制向租佃制过渡),这样就在封建主义危机和资本主义兴起之间直接建立了联系。斯维策与道布不同,他的研究重点是南欧。南欧的城市发展、海洋贸易、原始资本积累、殖民帝国的掠夺,显示出一幅资本主义

发展的真正图景。他认为自己的解释符合马克思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学说。

另一个争论焦点与世界体系论有关,这一理论被用来解释欧洲向近代社会的过渡。社会历史学家华伦斯坦认为:1500年时出现了一种全球性的变化,一种比较模糊的原因,也许是人口压力,导致欧洲在海外的扩张。西班牙、葡萄牙、法国、英国和尼德兰先后建成海外经济区,因而形成世界经济体系。商业给欧洲带来了利益,欧洲发展为经济中心。这个中心从南欧转到西北欧时,南部欧洲就开始衰退。西北欧高度发展了市场经济,农奴获得解放,而在东欧和非欧洲地区却推行了农奴制度。西欧的发展因此阻碍了东欧、拉美和世界其他许多地区的发展,使那里的农业、劳动力体制变得畸形。那些地区的发展不再按照自己的模式来发展,而是按欧洲的需要改变自己。华伦斯坦理论的重点,是经济发展地区和经济不发达地区的关系和世界体系内核心区的转移。^④美国人类历史学家沃尔夫也从世界交换网络出发论证社会的变化,认为商业交往为世界人民和文化奠定新的基础。^⑤沃尔夫对德国提到的不多,只提到两件事情:南部德国的银行偶然对西班牙帝国的金融提供帮助;德国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再版农奴制”,满足了西欧的粮食需求。社会发展的问題因此同发达国家压迫、剥削其他欠发达国家是密切联系的。

尽管存在着这些互相矛盾的看法,但对近代欧洲的兴起提出新见解的时机已经成熟。首先是世界学术界普遍认识到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这一问题的重要性,而不再简单地用某个事件如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或英国革命来解释近代欧洲的兴起。在中国,罗荣渠先生的《现代化新论》是关于社会发展理论问题的力作。自该书出版后,革命化与现代化这两个概念的界线被明确区分,欧亚政治、经济和历史发展的不同背景和特点被揭示。^⑥中国近年来还

出版和发表了几部关于欧洲从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专著和众多的论文,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侯建新先生的《现代化的第一块基石:英国农民力量的壮大》和沈汉、陈勇、刘景华诸先生关于欧洲转型、荷兰近代化和城市转型等方面的论著。在英文著作中,这方面最好的力作是1995年由美国历史学家托马斯·布雷迪、海科·奥伯曼和杰姆斯·屈瑞什主编的上下两卷《欧洲历史手册:1400—1600》,该书总结和归纳了近年来西方学者研究1400—1600年期间欧洲各个方面的成果。

我对近代欧洲兴起问题的探讨起于1993年。那时,我开始为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中古史专业的学生讲授“15、16世纪的欧洲”这门课程,为了上好这门课,需要编一本讲义。作为研究路德宗教改革的历史工作者,这一工作对我来说难度很大,但也使我有机会,对十五六世纪欧洲各个方面的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和学习,特别是政治、宗教、人口、家庭等方面的结构和内容。我的恩师托马斯·布雷迪先生给我以无私的帮助,慷慨地提供了不少原始史料,如《文艺复兴时期书信集》(罗伯特·克莱门德主编)、《文艺复兴史料集》(杰姆斯·布鲁斯·罗斯主编)、《新教改革》(汉斯·希尔勒布让德主编)和《德国农民战争文献集》(汤姆·斯高特和保布·斯克里卜尼主编)等。这些史料对我认识和探索十五六世纪欧洲社会的特征至关重要。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期间我得到了北京大学的著名学者罗荣渠先生、马克垚先生和美国伊利诺州立大学卡尔·塞迅教授的热情指导和帮助,对此我表示真挚和衷心的感谢。我也要感谢向我提出许多挑战性问题的北大历史系的学生们。没有导师、朋友和同学们的鼓励和帮助,本书的写作和出版是难以想象的。

这里的一种新探索,是把近代欧洲的兴起定在1350—1650年这一段时间中,而不是简单地以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或英国革命

等事件来划分。欧洲的变化经历了几个世纪,这几个世纪早就被人既骄傲又谦虚地称之为近代早期。然而,近代早期这个提法仍然是不够的,因为实际上这一时期中产生了一种可以自成一体、相当整齐的文明类型,即近代早期欧洲文明。这一文明既不同于中世纪欧洲文明,也不同于近代资本主义文明,因而可以单独划出。近代早期欧洲文明体现在新政治制度、新教、新经济、新文化诸方面,具有整体结构意义。本书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说明近代早期欧洲文明在欧洲近代化中所起的重要铺垫作用。如果没有近代早期文明的形成和铺垫,近代欧洲的产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本书探讨近代欧洲的兴起,不从工业革命后的欧洲谈起,而要从 1350 年谈起,因为工业革命与其说是近代欧洲兴起的原因,不如说是它的一种结果。

探讨欧洲近代化问题必然涉及到近代早期社会是否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这样,我们就触及到中世纪文明是如何衰退和近代早期文明的性质究竟如何的问题。“资本主义兴起导致了封建主义瓦解”,这一通常的看法其实很难概括 1350—1650 年期间欧洲历史的变化。欧洲中世纪的文明结构,如果以附庸制、庄园制、农奴制及重视彼岸的基督教意识形态为特色的话,那么,在 1350 年黑死病前后就开始走向瓦解,15 世纪末已经解体,而这时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尚未全面展开。事实上,在中世纪文明已经衰弱、资本主义真正发展前,欧洲实际存在着的是一种非中世纪、非近代的过渡性文明结构。因此,中世纪欧洲文明的衰弱和资本主义的兴起这两者并不能混为一谈,而中世纪文明衰弱、近代早期文明出现和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这三者之间也不能画等号。欧洲的近代化实际上是三个步骤,分别为中世纪文明的衰弱、近代早期欧洲文明的兴起和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诞生,这三者之间互有联系,互有影响。近代早期欧洲文明的位置处在中世纪文明与资本主义文

明之间,它取代的是主要因内部矛盾发展而自我衰败了的中世纪文明,迎接的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由于近代早期欧洲文明的尴尬位置,我们既不能直接把它当做中世纪文明的延续来对待,也不能把它直接等同于资本主义近代文明。如果把新教、新君主制、神法、社区主义和加尔文的神学都说成是中世纪体制或就是资产阶级伦理和资本主义制度,是很难令人信服的。因此,我在本书中提出近代早期欧洲文明这一概念,并视其为近代欧洲兴起的起点。近代早期欧洲文明对中世纪欧洲文明的取代,实质上主要是农业文明由较低效率向较高效率的演变,由于中世纪欧洲文明构造上的粗糙和不可操作,并且缺乏更多的弹性,所以它只得自我衰败下去,让位于高效率、比较精致的近代早期文明。这一变化,即为近代欧洲资本主义文明的产生作了铺垫和准备。

考察欧洲近代化,我们不由地想要知道欧洲人抛弃中世纪旧文明转向新文明的理由。或许,这产生于人们的一种失落感,一定有一些具体的危机促使欧洲人痛下决心,或者欧洲一定遇到了旧体制无法解决的麻烦,产生出一系列威胁性的危机,不采取断然的措施,生存就会成为问题。在一个风调雨顺、民安国泰的环境中,很难想象文明会发生激烈的突变。对传统的抛弃其实也是一种巨大的痛苦,当时最革命的农民阶级,他们的口号是“基督教兄弟之爱”、“人间天国”和“发扬上帝的荣耀”。他们对于乡村的习俗和“古之法”的沦丧抱着深深的怜惜态度。正是 1350—1600 年的危机和灾难,使欧洲人饱尝了各种饥荒、战争、人口压力、政治秩序紊乱、瘟疫和疾病之苦,再加上教会的贪婪、贵族的腐败,把欧洲推到了与传统文明决裂的门槛上。

或许,欧洲实行坚决的变革,还要依赖于振兴社会的新元素的形成,这可以用来克服危机,把社会引向比较有希望的秩序。旧的航道已经堵塞,巨大的欧洲之轮如何掉头转向?如果没有新文明

的产生,这一切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在危机面前,一些因素变成决定性的:促进货币商品关系的发展和发育市场机制,导致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产生;政治上,需要找到能够维持社会秩序、保卫和平的新体制,导致了欧洲新君主制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文化上需要新思想、新思潮,重新激起人们的热情,振奋长期沉默的欧洲大陆。欧洲的大部分地区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迈向新文明的门槛。能否跨越这个门槛,进入前所未有的近代文明,关键要看上述的进步能否成为一种稳定的力量,不是用来修补而是完全取代已经衰败了的封建秩序。

或许,这依赖于人们欢迎改革的态度和热情。当时比较流行的词汇如“复兴”、“改革”、“公正”、“神法”、“基督教之爱”等,包含着惊叹社会衰败、企盼寻找振兴社会新元素的心态。这种复兴计划,本质是撇开旧的腐败体制,在其之外寻找发展的新机制。大约从14世纪起,这项工作变得极为重要和富有创新精神,尤其在制度方面出现多种结构。政治制度方面,重要的有帝国制、君主制、等级会议制、城市共和国、诸侯公国模式、诸侯领地等。宗教领域方面,出现了多种神学理论和教会组织。经济方面,农业、商业、工业和海外事业齐头并举,而在经营上则形成了从“再版农奴制”到资本主义一系列相当不同的发展模式。人口、文化和社会结构方面,出现社会分化。这些发展现在看来仍是极富魅力的,因为在丰富多采的创造活动中,人们开始寻找新的秩序,开始注重事物内在的合理性和科学性。在追溯欧洲近代化的过程时,一种深切的感受就是,我们开始面对一个复杂的、多样化的社会。问题在于:如何从这些众多的结构中,发现欧洲文明发展的动力?

在探讨过渡时期各种状况并思索上述这些问题时,我的视线首先被政治方面的变化所吸引:一是封建制度的衰弱,二是封建政治衰败后的政治紊乱——它没有立即给欧洲带来稳定,反而在一

段时期内引发了社会秩序危机。在封建政治患绝症的时候,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寻找出路,各个阶层都在为自己的利益奋战,围绕着争夺政权和财产展开激烈角逐,时有贵族反叛,时有诸侯领地被侵占,时有公爵被赶跑,时有贵族流浪国外,但基本发展方向已经不能逆转。这个局面最后是这样被收拾的:一是君主们的改革,这是自上而下的道路,方向是统一和秩序,代表着政治发展的基本方向;二是普通人的革命,即通过社区运动和革命运动,自下而上地建立起参政机制。不管这两种改革如何对立,它们并不是完全不能合作共事的。它们共同反对旧的封臣制、贵族制、地方主义和城乡社会秩序的紊乱。作为合作的基础,国家体现出一定的公共性,使得政府和臣民的直接关系得以建立。一切横在政府和臣民之间的政治权威的势力被消除。中央化和民主化的双重发展,最后奠定了近代欧洲国家的基础。

然而,经济上的变化也许是更深刻的动因。王权和官僚制度是怎么强大起来的?贵族是怎么衰弱的?近代文明是怎么兴起的?当我们对这些问题进行冷静思考时,就会自然而然地联系到资本、货币和商业化的浪潮。这个浪潮向四处卷去,所到之处,贵族被迫改变经营方式,僧侣开始进行商业投机,农民的生活开始围绕着价格而上下波动。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欧洲人进行海外探险,企图依靠对海外民族的掠夺来积累工商业发展亟需的资本。欧洲各地的贸易市场和世界贸易市场在兴起,刺激着商业化的农业和手工业的崛起。农村经济和城市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涉及到许多人的生活、盼望和命运。不管人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农村的圈地运动和市场经济作何评价,这些经济方面的调整无疑给欧洲社会注入过活力。

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带动了社会结构的变化。贫富分化在加剧,瓦解了等级合作的基础,促成等级关系向阶级关系转化。政治

的动荡和经济的冲击导致了以往的社会结构的大改组，僧侣、贵族、农民这三个封建时代的基本等级失去了等级规定性。富人们联成一个新贵族和朝臣阶层，而城市平民、农民也联合了起来，形成了“普通人的阵营”。在普通人之下还有一个庞大的穷人阶层。穷人四面八方涌来涌去，出现流民潮。穷人阶层为城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市场，使得劳动力价格低下，结果是富人变得更富，穷人无立锥之地。

这个时期对大商人们来说，是真正的黄金时代。他们从来没有拥有过那么多的金钱，并对政治产生那么大的影响力。在城市中，城市贵族控制一切，他们精心选择如何用金钱换得自己所需要的一切。他们把子女送去经商或上学，部分人士通过学习，直接进入教会和政府的核心部门，成为一代新贵。商人们和君主合作，开始在等级会议或政府内阁中有了发言权。商人们用金钱换得贵族的称号，用金钱购得土地，可以任意控制物价，可以用高利贷不顾道义地剥削平民百姓。商人们的行为遭到贵族世家的不齿和广大农民的痛恨，但大家对他们又无可奈何。贵族要向商人借贷，农民的生计在某种程度也受商人控制。一种新的对立关系正在形成。

生活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大动荡之中的人们，很容易产生信仰危机和不安全感。意大利著名的艺术家米开朗基罗一再告诫家人，不要在大街上谈论时事，免得遭到不测。在欧洲的中部，出现对死神的崇拜，死神舞蹈的宣传木刻画比比皆是。在意大利距罗马城并不太远的地方，一些人在深夜之中没命地奔跑，他们是一些男巫，自以为在为人类的利益而同魔鬼进行坚持不懈的夜之战，直到罗马教会的宗教裁判所把他们当做异端而处以死刑。人文主义的思想家渴望通过教育来恢复人间的道德，而另外的一些人如马基雅维里和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则对人间的罪恶不再抱有幻想，前者正式宣布人性是邪恶的，后者把希望寄托于同冥冥天

国中的基督的神秘交往。无论是僧侣还是俗人,都在盼望一种新的法律和道德秩序,正如他们盼望一种良好的宗教秩序一样迫切而虔诚。

信仰危机和宗教改革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也许,正是信仰危机为罗马教廷的危机、福音运动和《圣经》主义、僧侣的宗教改革和农民、市民、贵族、国王的宗教改革铺平道路。一是神学方面的问题:如什么是基督教的新基础,教会的权威如何回归“纯粹的上帝之言”。二是教会的组织问题:物质的、世俗化了的教会如何向精神性、不可见的教会过渡。国王、诸侯、城市和乡村也有实现教会国家化、地区化、社区化的企图,希望把教会掌握在自己手里。宗教改革家企图把教会的世俗成分还给世俗的政治权威,希望宗教能脱离世俗权力,找到与新时代的社会体制共存的新基础。

在旧文明普遍遭人厌弃之时,欧洲人在建立新文化时不会有太多的犹豫。人们期望新文化、新价值和新思想,并从中获得了对自我尊严的认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最初目的都在于克服社会躯体上的一些弊病,如解决僧侣腐败、赎罪券买卖问题等,结果却对新文明建设作出了贡献。人文主义者的思想不仅在意大利促进了文化、艺术和科学方面的发展,更在中欧和瑞士同加尔文、慈温利等派别的宗教改革运动有所交叉,成为社会改革的推动力。从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教育救国方针到加尔文、慈温利和闵采尔等人的基督教社区或“人间天国”,我们不难看出一种联系,但唯有奥古斯丁派修道院出身的僧侣马丁·路德又当别论。路德视自己的理论为“精神性”的,批判农民企图把他的理论“物俗化”。他基本上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所谓路德文艺复兴的提法近年来已经遭到了抛弃。此外,农民也提出了自己的基督教理论,把神学解释为众人平等、公共利益和基督教兄弟之爱。农民的信仰无疑是一种新的力量,此后,基督教的神法就取代了反映乡村习俗

的古之法,成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新理论。人文主义同宗教改革间的复杂联系,宗教改革和社会改革间的联系,都证明这一时期人们在文化上、思想上有了很多新的建树。

复杂的社会运动带动了教育的发展。通过学校教育和教科书来传播的文化,已经占据了支配地位,并已不再是少数人所掌握的技能。教育在西欧向近代社会过渡中的作用是无可置疑的。各个国家、各个诸侯领地和农民战争的纲领中都把教育看作是发展国家力量的重要环节。这种对教育的重视,与中世纪人们视教育为一种贵族修养的做法完全不同。这不仅是由于人们认识到一个近代社会离不开科学、技术,还因为人们已认识到如果教育不进行发展,近代的政府、工商业就无法启动。

社会变革同样也引发了革命。革命首先起于下层民众,德国农民战争可以看成是普通人从改革走向革命的转折点。既然人民的要求无法在改革模式中实现,那么大规模的革命就是可能和必然的。这些运动体现了人民的力量:即知识分子、改革者、市民和农民的力量。德国农民战争中人民起来反对封建主义,农民的政治意识有所加强,这说明社会虽在发展中,但社会又在剧烈冲突。对改革和革命的联系要求我们重视这些方向互不一致的社会力量,只有经过科学的综合性考察,才能理解这个时期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

所有这一切,说明一个新文明正脱颖而出。这些互相交织和影响着的要素之一,就是宗教和教会。从整体看,社会是运动着的,各种因素之间既独立发展,又形成一种互动结构。如政治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这两者始终是相辅相成的。国王和贵族的旧脑筋通过战争和奢侈生活大肆挥霍,破坏了来之不易的经济基础,不仅使得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未兴即衰,导致神圣罗马帝国的不能统一,并且还拖垮了意大利的银行。在比较开明的英国和法国,社会

发展迅速,原因是市民阶层获得了一定的政治权力。新君主制比较开明,较少地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

为了说明上述的发展,本书将探究十五六世纪的欧洲。具体地说,是研究英国、法国、德国、瑞士、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中西欧国家在这一特定时期中的发展。本书不涉及对东欧和俄国的讨论,因为那里的发展道路同西欧具有明显不同。东欧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工商业的发展都要比西欧缓了一步。把讨论的重点放到西欧,可以更加清楚地分析一个西欧发展模型。但困难之处在于,即使只是在对西欧进行研究,巨大的不平衡性在西欧各国也是显而易见。

本书讨论十五六世纪欧洲的社会发展。具体地说,讨论社会各个阶层和人口、家庭制度的变化,这必然涉及人和社会这一主题,因为人同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是密不可分的。人口问题不单纯是一个人口数量的问题,它涉及到土地、分布、资源利用等多方面的因素。如果说欧洲人在十五六世纪有很大变化的话,那么首先要考虑那时的人们是在一个更为广阔的时空范围内生存。本书的讨论还涉及等级制度如何向阶级关系变化的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僧侣、贵族和农民是如何在新文明中变成富人和普通人两大阵营的,以及资产阶级、新贵族、雇工和穷人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影响的。

本书探讨经济方面的调整。具体地说,讨论农村经济和城市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涉及到对许多人的生活 and 命运的关注。我们看到在农村出现农业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同时,城市中的市场和商品经济却在逐渐兴起。我们还看到一些结构性的变化,如社区化、土地制度改革、资本主义公司等。经济方面的调整显然给西欧社会注入了活力,使欧洲经济开始好转。这种变化同时也给所有人们的生活带来影响,最引人注目的是统治者对人民加剧剥削,城

市的发展和农村的发展之间又出现了不平衡性。城市的发展是在过度利用农村的资源和牺牲农民的利益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导致农业资本投入的不足和出现大量背井离乡的穷人。与此同时,经济上的贫富决定了人们的社会地位,富人们联成一个富人阶层,而城市、农村的人们也联合了起来,形成了普通人的阵营。

本书探讨政治方面的变化。具体地说,是讨论封臣制的衰退、中央化的君主政府兴起和中世纪后期社区化运动的命运。这些发展使得国家从私家政治转向代表公共利益的新政府。君主和市民的结盟、权力和资本的交换,是理解政治方面变化的基础。自下而上的社区运动不容忽视,它虽然不是政治近代化的起点,却是政治民主化的一种基础。

本书讨论基督教和教会的变化。具体地说,讨论罗马教廷的危机,福音运动和《圣经》主义,僧侣的宗教改革和农民、市民、贵族、国王的宗教改革,这里有三方面的问题:一是神学方面的问题,即什么是基督教的新基础,教会的权威如何回归给“纯粹的上帝之言”;二是教会的问题,即物质的和可见的教会如何向精神性、不可见的教会过渡;三是政教冲突的问题,即国王、诸侯、城市和乡村对教会的态度和要求如何,怎么看待民族教会和基督教社区这样的制度的产生。在近代早期欧洲文明中,教会的力量总的说是在下降,世俗政府的权威性在增强。教会通过抛弃部分的世俗权力,反而使它找到了与新的社会体制共存的新的平衡方法。

本书讨论这一时期文化上的变化。具体地说,讨论中世纪文化是如何衰弱的,新文化是如何产生的,以及近代早期文化的性质问题。此外,人文主义、宗教改革思想和农民的信仰,以及这些思想对社会的影响,也将得到重视。

过渡时期的文明是复杂和多变的。社会往往表现出多种因素的兴衰和交替。多元的、成对的和相反的力量在某一个地区流行,